



C2012059246

地理政治学与大战略

吴征宇 / 著

中国法制出版社
CHINA LEGAL PUBLISHING HOUSE

地理政治学与大战略

吴征宇 / 著



C2012059246

中国法制出版社
CHINA LEGAL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地理政治学与大战略 / 吴征宇著. —北京: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2. 4

ISBN 978 - 7 - 5093 - 3664 - 9

I. ①地… II. ①吴… III. ①地缘政治学 - 研究
IV. ①D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65569 号

策划编辑 周林刚

封面设计 蒋 怡

地理政治学与大战略

DILIZHENGZHIXUEYUDAZHANLUE

著者/吴征宇

印刷/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787 × 1092 毫米 32

版次/2012 年 4 月第 1 版

印张/7.375 字数/149 千

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

书号 ISBN 978 - 7 - 5093 - 3664 - 9

定价: 25.00 元

北京西单横二条 2 号 邮政编码 100031

网址: <http://www.zgfs.com>

市场营销部电话: 66017726

传真: 66031119

编辑部电话: 66067024

邮购部电话: 66033288

本书系上海世界观察研究院专项研究成果



目 录

导 论 地理政治学与大战略	(1)
 第 I 部分 海权论与陆权论	
第 1 章 “海权对历史的影响”	(25)
第 2 章 “心脏地带”与“边缘地带”	(56)
第 3 章 海权论与陆权论的大战略内涵	(85)
 第 II 部分 海权、陆权与大战略	
第 4 章 地理政治与主导性海洋强国	(117)
第 5 章 心脏地带强国的历史命运	(146)
第 6 章 陆海复合型强国的战略地位	(176)
 第 III 部分 结束语	
第 7 章 地理政治与 21 世纪的世界	(209)
后 记	(231)

导论 地理政治学与大战略

作为人类用以思考和判断地理因素之社会作用的一种理论形式，地理政治学是一门专门研究地理环境与国际权势竞争间互动联系的科学。它考察的对象主要是地理环境与国际权势竞争两者在政治和战略上的相关性，关注的重点则在于各种形式的地理环境对国际权势变更的重大影响，以及同地理因素作用密切相关的技术、组织、人口等因素的变化趋势对于国际权势对比所具有的内在涵义。在现代世界历史上，地理政治学虽然对历史发展产生过非常重要的影响，但迄今人们仍然很难界定其确切涵义，而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地理政治学在长期发展中已经带上了许多不同的内涵。但不论其内涵究竟有多少差异，地理政治学的具体形态一般都表现为某种从空间角度对人类政治实践（尤其是国际关系实践）进行的研究。自从诞生之日起，地理政治学的发展不仅受到其所处时代的影响，而且更是受到不同民族或不同国家特有的对外政策关切的影响，也正是这些影响使其从一开始便已形成了特色鲜明的三大思想传统，即盎格鲁—萨克逊民族的经典地理政治学、德国地缘政治学和法国维达尔传统，这三大思想传统间的重合与分歧也正界定了 20 世纪西方地理政治思想的发展轨迹。二战结束后，由于德国地缘政治学与纳粹侵略扩张政策间的密切联系，地理政治学在战后相当一段时间内几乎遭到了人们异口同声的唾弃。但这种状况并没有能够导致地理政治学的消亡。

事实上,地理政治学在战后仍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这种发展集中体现在战后美国对苏联及共产主义阵营的遏制政策及相关的战略研究中。地理政治学在战后所以被看作是某种禁忌,关键是由于它提供的知识和技巧与国家的意识形态和政策目标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极易被许多人加以利用。但这种缺陷不应归咎于地理政治学的本身,而是应归咎于它所服务的意识形态和政策目标。地理政治学虽然不属于任何特定的思想体系,但也不是价值中立的学科,它总是会受到既定的政治观和道德观的影响。地理政治学虽然产生过许多恶劣的影响。但真正的问题应该是政治的和道德的,而非其自身的。

1、地理政治学的内涵与本质

作为一门专门研究地理环境与国际权势竞争间相互关系的科学,地理政治学诞生于“世纪末时代”(即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的欧洲,自从其诞生之日起,地理政治学的形成与发展便深受那个特定时代的政治局势和社会思潮的影响,而正是这些影响导致了地理政治学一开始就带上了非常鲜明的时代烙印。在 20 世纪以后的历史上,地理政治学的应用虽然已经非常广泛,但迄今为止人们对地理政治学的确切涵义仍然是众说纷纭,而这点从根本上说乃是因为“地理政治”并不是一个有固定内涵的术语,而只是一个随历史发展和时代变迁不断变化的暧昧且充满不确定性的概念。与这种不确定性相对应,尽管“地理政治”一词在当代国际政治话语中已经成为了一个通俗性词汇,但迄今为止人们对地理政治学的内涵与特征及其与德国地缘政治学、当代政治地理学的联系与区分仍然存在许多模糊不清的认识。这种状况不仅导致了人们对地理政治学的

误解与偏见，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同样也妨碍了地理政治研究的进步。

地理政治学的涵义与特征

在现代政治思想史上，地理政治学大致上有两种内涵：广义上的地理政治学指任何致力于地理环境和政治现象间的互动联系及因果关系的研究，这种意义上的地理政治学既包括了各种基于特定地域视角的专门著述，同时也包括了从空间角度对国际权势结构进行的整体性研究；狭义上的地理政治学则是指基于历史上的海权与陆权的相对重要性及由此引申出的各种战略涵义而阐发的一整套彼此间有密切联系的理论，这种意义上的地理政治学通常也被称为“经典地理政治学”。〔1〕作为一种特定的理论形式，地理政治学包含了两类不同性质的变量：一类是地理变量，其中既包括自然地理变量，也包括与此相关的人文地理变量；另一类是技术性变量，其中既包括人们熟知的物质性技术，也包括那些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组织性技术（政治、经济与社会的组织形式）。地理政治学根本上乃是一门有关这两类因素间的互动联系及其在政治和战略上的相关涵义的科学。〔2〕与其他形式的国际政治理论相比，地理政治学最根本的特点，不仅是在于它力求达到的乃是某种对世界政治格局的整体认识（即它的内容虽然可能是针对某些相关的物质环境

〔1〕 Geoffrey Parker, *Geopolitic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London: Pinter, 1998, p. 5.

Oyvind Osterud, "The Uses and Abuses of Geopolitics",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25, No. 2, 1988, p. 192.

〔2〕 Harold Sprout, "Geopolitical Hypotheses in Technological Perspective", *World Politics*, Vol. 15, No. 2, 1963, p. 190.

的考察,但它的最终目的则是达到对世界政治格局的更为清晰的整体认识),而且在于它重点关注的乃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止的”局势,即客观的地理环境虽然不会经常地发生改变,但随着技术、组织和人口等因素的变化,客观的地理环境在政治和战略上的相关性也必然将发生相应的变动。〔3〕与19世纪以前的类似研究相比,现代地理政治学的根本特点,在于摒弃了有关自然环境对人类政治生活实践的决定论视角,并且将注意力集中在地理环境与技术、组织、人口等因素的互动联系而产生的对外政策或对外战略的涵义上,只有在同特定的观念或意识形态(例如种族主义、生存空间、经济自足等等)结合在一起时,现代地理政治学才会具有某种决定论的意味。

地理政治学与地缘政治学

英语中的 Geopolitics 源于德语中的 Geopolitik, 它们在许多著作中往往同时出现,其目的就是为便利人们对两者进行区分。1899年,瑞典政治学家鲁道夫·契伦在一篇有关瑞典边界问题的文章中最早用瑞典语创造出 Geopolitik,这个词后来与契伦的著作一起被引入到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这个词在德国有关国际事务的话语中越来越成为一个通俗性词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推动了 Geopolitics 的出现,但这个词从一开始便带有自相矛盾的意味:一方面,Geopolitics 是一个与权力政治或侵略扩张密切联系的禁忌词,但同时,

〔3〕 Geoffrey Parker, *Western Geopolitical Though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Croom Helm, 1985, p. 2.

Mackubin T. Owens, "In Defense of Classical Geopolitics",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Vol. 52, No. 4, 1999, p. 60.

Geopolitics 同样是一种研究同盟国无法忽略的战略现实的必要路径。〔4〕在现代历史上，地理政治学虽然产生过许多重大影响，但自诞生之日起这门学科就带有许多不祥的内涵，很多人迄今仍然将这门学科看成某种地理决定论或是对国际侵略行为的辩护，这些负面看法的形成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 20 世纪 30 年代德国“慕尼黑学派”曾经对地理政治学进行的歪曲。正是因为如此，人们一般将德国“慕尼黑学派”的学说称为地缘政治学（Geopolitik），而将其他考察地理环境与政治结果间互动联系的学说称为地理政治学（Geopolitics）。这两种学说间的区别在于，前者实质上是某种形式的地理决定论，而后者则始终认为应当将地理因素与其他相关因素结合在一起进行考察。尽管 Geopolitics 和 Geopolitik 在严谨的学术文献中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术语，但中国学者迄今为止却几乎没有对两者进行过任何有实质性意义的区分，而是将两者全部都译作为“地缘政治学”。1992 年，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国际地理协会副会长、中国地理学会副理事长吴传钧先生在他给英国学者杰弗里·帕克 1985 年出版的一本著作的译序中，曾经明确指出 Geopolitics 和 Geopolitik 应当分别译为“地理政治学”和“地缘政治学”，但可惜他的意见似乎从来没有引起过国内学者的任何重视。〔5〕

地理政治学与政治地理学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在绝大多数西方学者撰写

〔4〕 Derwent Whittlesey, *German Strategy of World Conquest*, London: Robinson, 1983, p. 58.

〔5〕 杰弗里·帕克：《二十世纪西方地理政治思想》，李亦鸣、徐小杰、张荣忠译，解放军出版社 1992 年版，译序。

的严谨的学术性文献中，地理政治学（Geopolitics）与政治地理学（Political Geography）两者间的界限已经越来越难以分清。这种情况乃是由两个原因造成的：首先，由于 20 世纪前半期德国地缘政治学曾经给地理政治学带来过几乎无法洗刷的恶名，因而战后绝大多数从事相关研究的学者都更愿意将自己的研究称之为“政治地理学”而不是“地理政治学”，以此来避免后者给自己的学术声望可能带来的任何不利影响；其次，无论在研究方法还是研究对象上，“政治地理学”与“地理政治学”两者间确实也没有存在过多少本质性的区别，至少就战后大多数西方学者理解和从事的研究而言情况是如此，而这点意味着“政治地理学”很容易剥夺“地理政治学”的研究领地。〔6〕“政治地理学”与“地理政治学”两者唯一的实质性区别就在于它们的关注重点不一样：“政治地理学”作为地理学的分支一般都是将关注重点集中在地理现象上，即提供地理现象的政治解释和研究地理现象的政治方面；“地理政治学”作为政治学的分支一般来说都是将关注重点集中在政治现象上，即提供政治现象的地理解释和研究政治现象的地理方面。而这种区别很大程度上也就意味着，“地理政治学”的真正要义从根本上说就是这个词的本身在词源学意义上提示的东西：地理的**政治学**，即它是政治学而不是地理学，也就是一种从空间视角对政治现象来进行解释和分析的政治学。由于是一门中间性的学科，“地理政治学”的研究领域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地

〔6〕 Leslie W. Hepple, “The Revival of Geopolitics”, *Political Geography Quarterly*, Supplement, Vol. 5, No. 4, p. 23.

理学和政治学的研究领域及两者间的关系来加以界定的。〔7〕在现代世界历史上，各种形式的地理政治思想所以能够对历史发展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其原因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客观的地理环境不仅会对一国的对外政策和对外战略施加许多特殊的限制，而且也会给一国的对外政策和对外战略提供许多独特的机遇。

2、地理政治学三大思想传统

现代意义上的地理政治学诞生于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那个极度动荡不安的年代。它的形成和发展受到了两个特定因素的影响：首先，工业革命造成的各种变化使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对即将到来的新世纪充满了希望和恐惧，而由此产生的认识、解释和指导这些变化的渴望是现代地理政治学的催化剂；其次，到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西方人的海外探险时代已经宣告结束，整个世界首次以前所未有的面貌完整呈现在西方人面前，而这点正是为那种以整体认识为终极目标的地理政治学的诞生创造了条件。无论是作为分析方法还是专门理论，地理政治学从来也不是价值中立的产物，而是体现出不同民族或不同国家在对外政策问题上特色鲜明的抱负，即地理政治学的形成和发展不仅受到其所处时代的影响，同时也受到其主要思想家代表的特定民族或特定国家的对外政策关切的影响。这种影响导致的一个主要后果，就是使 20 世纪的地理政治思想无论在思想内容还是理论形态上，一开始便形成了特色鲜明的三大思

〔7〕 Ladis K. D. Kristof, "The Origins and Evolution of Geopolitic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4, No. 1, 1960, p. 36.

想传统，即盎格鲁—萨克逊民族的经典地理政治学、德国地缘政治学和法国维达尔传统。

经典地理政治学 (Classical Geopolitics)

无论就理论还是实践而言，经典地理政治学都是对后世的大战略影响最大的流派。这个流派的三位代表性人物都是来自以盎格鲁—萨克逊民族为主体的海洋国家，这三个代表性人物分别是美国海军史学家和战略思想家阿尔弗雷德·马汉 (Alfred T. Mahan)，英国地理学家和战略思想家哈尔福德·麦金德 (Halford J. Mackinder) 以及美籍荷兰裔国际政治学家尼古拉斯·斯皮克曼 (Nicholas J. Spykman)。^{〔8〕}经典地理政治学从根本上说有两个主要特征：首先，经典地理政治学首次明确将世界看作是一个整体，而它探讨的就是在这个封闭体系中反复出现的国家间关系模式，这种模式的表现形式主要是历史上海权与陆权间的永恒对抗；其次，经典地理政治学在强调地理因素作用同时，始终认为应将其同其他因素结合起来进行考察，即任何特定时间的政治力量对比不仅是地理条件的产物，也是由各方在人力、组织、技术等方面比较中得出的结果。^{〔9〕}经典地理政治学的形成和发展实质上体现了那些以盎格鲁—萨克逊民族为主体的海洋国家（英国和美国）在那种极度动荡的年代中特有的对外政策关切，这种关切的根源主要是工业革命引发的技术进步与宏观地理环境间的相互作用使海权与陆权间

〔8〕 Mackubin T. Owens, "In Defense of Classical Geopolitics",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Vol. 52, No. 4, 1999, p. 62.

〔9〕 Geoffrey Sloan, *Geopolitics in United States Strategic Policy 1890 - 1987*, Brighton: Wheatsheaf Books, 1988, p. 58.

的力量对比开始朝着不利于前者的方向发展,而这点很大程度上意味着,海洋国家在经过工业革命改造的世界上将日益会面临大陆国家强有力的挑战。^[10]在现代地理政治思想史上,经典地理政治学的关注焦点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由工业革命引发的技术、组织、人口等因素的变化趋势,对海洋国家与大陆国家间力量对比具有何种潜在涵义;二是为维持盎格鲁—萨克逊民族世界领导地位,海洋国家在对外政策大战略上究竟应采取什么手段。这两个问题实际上是海洋国家在 20 世纪世界政治中始终面临的两大根本问题,同时也正是经典地理政治学所以能够对战后美国对外政策产生重大影响的关键原因。

德国地缘政治学 (Geopolitik)

地缘政治学形成于 20 世纪 20 至 30 年代的德国,这个流派最重要的代表性人物,就是一战后出现的德国“慕尼黑学派”的首要代表卡尔·豪斯浩弗 (Karl Haushofer)。与这个流派密切相关的还有另外两位重要人物,他们都是来自德国或深受德国文化影响的国度,一位是德国著名地理学家弗里德里希·拉采尔 (Friedrich Ratzel),另一位则是瑞典著名政治学家鲁道夫·契伦 (Rudolf Kjellen)。与那种主要关注在全球性封闭体系中反复出现的国家间关系模式的经典地理政治学不同,地缘政治学的首要特征在于明确将现代民族国家看作一种在有限的地理空间中寻求生存的有机体,并且进而在此基础上强调所谓“种族构成”和“生存空间”对现代民族国家的生存与发

[10] Daniel Deudney, "Greater Britain or Greater Synthesi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7, No. 1, 2001, p. 191.

展具有的重大意义。〔11〕从根本意义上说，地缘政治学的形成和发展实际体现的乃是 19 世纪末期曾经风靡一时的“达尔文主义”对 20 世纪社会科学的巨大影响，而这种影响同日耳曼民族的终极使命感结合在一起导致的主要后果，就是使地缘政治学带上了极为明显的地理决定论（也就是摩根索曾经所说的“单因论”）的色彩。地缘政治学确切地说包含了两大根本主题：一是为身处列强重重包围中的德国、尤其是一战结束后处于凡尔赛体系重压下的德国，寻找摆脱各种外在的枷锁以及适合其最终成长为世界强国的发展道路；二是为德国最终能够成长为世界强国而教育民众，从而使他们能够具有某种足以与世界强国地位相称的空间意识。〔12〕地缘政治学与二战期间纳粹德国的侵略扩张政策间虽然并不是完全一致的，但地缘政治学固有的那种赤裸裸的地理决定论色彩同样使其在二战结束后遭到了人们的普遍唾弃，而造成地缘政治学带有强烈决定论色彩的根源，是它与 1848 年后逐渐形成的德意志民族主义、尤其与日耳曼民族对现代欧洲负有的终极使命感间过于密切的结合，而正是这种结合注定了地缘政治学的生命力无法持久。

法国维达尔传统 (The Vidalienne Tradition)

法国地理政治研究的维达尔传统很大程度上是在同德国地缘政治学的对立斗争中形成的。这个流派的代表人物都是生活在 20 世纪前半期的法国学者，其先驱者是法国地理学家保罗

〔11〕 Geoffrey Parker, *Geopolitic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London: Pinter, 1998, p. 20.

〔12〕 John H. Paterson, "German Geopolitics Reassessed", *Political Geography Quarterly*, Vol. 6, No. 2, 1987, p. 108.

· 维达尔· 白兰士 (Paul Vidal de la Blache), 活跃在两次世界大战间隔期间的德芒戎 (Demangeon) 和昂塞尔 (Ancel) 这两位著名的法国地理学家同样是维达尔传统的主要实践者。法国维达尔传统相对于德国地缘政治学具有的根本性特征, 不仅在于它明确强调地理政治学应当从属于人文地理学的传统 (即地理政治研究必须在某种人文地理学框架内才能够进行), 而且在于它强调人类在客观的物质环境 (尤其是客观的地理环境) 的约束中是一个 “积极” 而不是 “消极” 的行为体。^[13] 法国维达尔传统从根本上说是那些生活在 20 世纪前期的法国学者为了反对德国地缘政治学宣扬的那种赤裸裸的物质 (地理) 决定论而发展起来的, 而这点同样也从根本上决定了, 无论就指导思想还是具体内容而言, 法国维达尔传统与德国地缘政治学都可谓是针锋相对的。自 1871 年德国统一以来, 法国的大国地位开始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尽管法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 但这种胜利很大程度上并没有抵消掉德国相对于法国的权力优势。自 19 世纪后半期以来, 法国对外政策中关注的首要问题, 就是如何确保法国在现代世界政治中的大国地位。^[14] 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 法国维达尔传统很大程度上体现了那个时代中法国 (包括其海外属地) 的对外政策关切。然而, 与德国地缘政治学宣扬的那种纯粹的地理决定论不同的是, 法国地理政治学家对这种政策关切给出了两个答案: 一是将法国建设成英国那样的殖民帝国, 二是在欧洲联合框架内谋

[13] Geoffrey Parker, *Western Geopolitical Though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Croom Helm, 1985, p. 90.

[14] Oyvind Osterud, “The Uses and Abuses of Geopolitics”,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25, No. 2, 1988, p. 197.

求法国的大国地位。这两种答案也正是维达尔传统最富有特征性的两大核心主题，这两大核心主题的影响力在二战后甚至是冷战后的法国对外政策中仍然清晰可见。

3、地理政治学在战后世界的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地缘政治学由于被普遍地认为与二战期间纳粹德国的种族灭绝及侵略扩张间存在有密切联系，因此除批判性的历史研究外，无论在思想内容还是研究方法上，德国地缘政治学都完全销声匿迹；与德国地缘政治学相似，具有强烈批判精神的法国维达尔传统在战后同样偃旗息鼓，一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批判性地理政治学”（Critical Geopolitics）的逐渐兴起才使得具有浓厚“人文主义”色彩的法国维达尔传统部分地得到复兴。在战后国际关系史上，真正获得实质性发展的乃是体现了盎格鲁—萨克逊民族对外政策关切的经典地理政治学，这种发展的核心动力主要是来自经典地理政治学揭示的权力政治逻辑（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地理政治逻辑）与二战后美国对欧亚大陆核心区域的大战略间存在的密切联系，尽管战后美国的对外政策话语中很少会出现“地理政治”一词，但经典地理政治学体现的大战略思想实际上已经深深地渗入到二战后美国在欧亚大陆上进行的大战略实践中。

地理政治学与“遏制战略”

与德国地缘政治学和法国维达尔传统相比，主要由马汉、麦金德和斯皮克曼阐述的经典地理政治思想的关注焦点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由工业革命引发的技术变动趋势对海权与陆